

官博不妨多与大V论争

■严辉文

时事聚焦

随着武汉一特大网络造谣团伙被查获,山东“高压泵地下排污”谣言的真相也开始大白于天下。围绕此问题,最近几天,山东省环保厅与曾经就此提出质疑的网络大V邓飞进行的微博辩论,颇具看点。

既打击网络谣言,又重视网络舆论监督,是当前网络良性发展所面临的突出任务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@山东环境与@邓飞就山东省环境污染状况进行交锋辩论,具备了标本性的意义。

山东省环保厅勤于开通微博也勇于与网络大V进行辩论,值得肯定。眼下,环境保护的总体态势不够理想,这也容易让一些环保部门视网络舆论为畏途。一些环保部门常常乐于以一些传统报刊为宣传阵地,以

软广告的形式来发布环保政绩。这难免被视为自说自话,甚至,某地还曾发生过网民悬赏让环保官员到某个臭不可闻的河游泳期间,地方党报仍对当地环保政绩进行宣传的尴尬情形。而在微博上,网民则对环境污染的状况痛心疾首,却苦于互动无门——环保部门要么不开通微博,要么开个“非礼勿听非礼勿视”又懒又傲慢的微博,根本懒得参与和回应网民有关环境保护的议题。

这一次山东省环保厅高调发言是有着特殊背景的。造谣山东“高压泵地下排污”的网络造谣团伙被查获,让山东省环保厅一时间有了与网络大V交锋的底气。加之“高压泵深井排污”在技术上不可行,环保部门单方面调查的“所有举报竟无一属实”,使得@山东环境自认道理充足,一开始多少有点咄咄逼人,质问“在这个事件当中邓先生究竟发挥了什

么作用”“希望邓先生勇于担当才好”。几轮交锋之后,@山东环境最新的微博回应已经平和多了:不会要求邓飞道歉,但是非常欢迎“邓先生能作自我批评”。

这种对话姿态的转变,正是拜微博辩论所赐。没有微博的情况下,或者没有进行微博辩论的情况下,官方的情绪常常是急躁且对立的,容易认为网民多是无事生非,为了唱衰而唱衰。及至进行微博辩论之后,了解到“高压泵深井排污”微博并非@邓飞原创,邓本是环境保护的热心人士,且只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转发了有关微博。@邓飞也许有过失,而@山东环境作为官方微博,在学会与网民平等互动真诚融合方面,进步则是明显的。既打开了对话的大门,又争取了环保的同路人。

所有的环保部门,所有与国计民生相关的职能部门都开通微博,网民

肯定会非常欢迎。以山东省环保厅为例,通过微博辩论,既澄清了相关谣言,又凝聚了环保共识。其实,除个别造谣者外,大多数网民都是环保热心人士。环保部门不是曾经抱怨地方政府招商导致环保压力重重么?不是曾经抱怨排污企业排污防不胜防么?不是曾经忧虑环保不能仅靠环保部门么?有这些热心网民的参与,一些企业的违规排污行为就将无处遁形,这恰恰是环保部门不花钱的低成本盟友。

环保部门开通微博与网民之间进行良性互动,既可以指出网民在环保方面不专业的错误,又可以澄清一些谣言。在这个过程中,官方也可以学会听得进听得懂听得习惯不同的意见,网民的举报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,他们的批评有时可能话难听了点,但总体上有利于改进相关工作。

(来源:中国青年报)

新《旅游法》能否让旅游从此变从容?

■刘阳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。关于新法对国庆假期旅游市场影响的猜测与担心甚嚣尘上,许多线路价格日益看涨。新法或将改变旅行团的盈利模式和游客的消费结构,从长远来讲,有利于改变人们对旅游行为的理解和认知,使旅游市场更加规范,让旅游生态更加文明。

《旅游法》一纸“限购令”意味着“超低团费+强迫购物”的旅行团模式走到了终点。原本隐性的购物支出不得不晒在阳光下,使“分段消费”变成了“一次结账”,催生旅游线路团费的猛涨。分析人士指出,这种可预见的增长流于表面,游客的整体实际支出变动不大。

新法在旅行消费结构上有着明确的导向,大幅挤压购物支出的比例,将消费引导到门票、酒店、餐饮、民俗文化活动等项目上来。旅行文化正期待一次从“观光购物”到“深度自助”的变革,从满足购买特产的物质需求到休闲体验的心理需求的变革。

时下,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在国内景区屡见不鲜,尤其是在境外的“窘态百出”更被贴上了“中国特色”的标签,影响了中国人的海外形象。这和多年来粗糙肤浅和流于形式的旅行习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一个健康有序的旅游生态需要人们改善现有的旅行模式,共同规范行为,呵护旅游文明。《旅游法》是对旅游市场所有主体责任方的行为约束。规范旅行社的组织活动,旨在改善旅游市场环境;对游客提出行为要求,是为了引导健康合理的旅行方式。

曾几何时,游客被“零团费”诱惑,参与“走马观花,到此一游”的观光团,被戏谑为“上车睡觉、下车撒尿、到了景点、购物拍照”。这种单调乏味的方式如何给游客带来身心的愉悦呢?旅行的意义在“购物模式”大行其道的冲击下逐渐变得浮躁和狭隘。

当人们不必疲于购物时,才会重新珍惜旅行中那些曾被忽略的瞬间。既然团费变得昂贵,为什么不选择更加自由从容的“自助游”呢?既然旅行变得从容,为什么不选择更加融入当地风俗文化的“深度游”呢?当疗养休闲真的变得“养人和闲适”,当游客对当地特色人文历史培养出了亲近的体验感受,旅游才真正回归精神文化活动的本质。

(来源:新华社)



近日,“北京正在研究征收拥堵费”的消息不仅引起了当地市民的关切,也引发全国其他城市群众的忧虑。人们不禁要问,限行、限牌、限外地车都没有解决的大城市“拥堵病”,能用收费的方式“药到病除”吗?在“拥堵费”引发普遍质疑的背后,暗含着人们对理性“治堵”的期待。

应该说,交通部门为治堵想了很多办法。想要找到好的“治堵妙计”,需要科学的“顶层设计”,摸索出一套科学、民主的决策流程。从长远看,中国的大城市“治堵”应逐步淡化行政强制手段,过渡到用市场化手段和吸引市民主动参与以实现出行习惯的调节。行政作为救济的过渡性政策不宜长期存在,一味收费也不是真正的市场化科学管理。法治取向、全国视角、民生关切,相关部门应该兼顾这些角度审慎思考,解好交通管理这道复杂的难题。

■冯印澄

如何让人相信“几万学费不会打水漂”

■胡印斌

手拿成都某高校的本科录取通知书,家住成都市槐树店路的玲玲(化名)却不知道自己的路在何方。这段时间以来,为上大学的事她和父亲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谈判,但父亲固执地认为“读书无用”,他宁愿出钱资助玲玲做点小生意,也不愿“扔几万学费进去打水漂”。(《成都商报》9月2日)

每隔几年,“读书无用论”就会冒出来挑战民众的鉴别力,也几乎每一次,人们都会认真地参与讨论。这样的争论,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,恰恰表明,在“读书有无用处”这个问题上,还远没有达成共识。

读书有没有用其实自不待言,问题的关键在于,这里所说的“用”,具体指向什么?如果单纯从玲玲父亲的角度出发,他可能看到更多的是基于现实的“有用无用”:读书之后,能否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;四年花费8万、少挣8万合计16万元

的机会成本能否拿得回来,等等。考虑到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实,就不难想象玲玲父亲的担忧。

特别需要指出的是,作为一个做小买卖的小商贩,玲玲父亲的视野所及,也应该多是社会底层的民众,而这部分民众经由读书而改变命运的机会,显然更加稀缺。在他的身边,“读书——失败”的例子,可能远比“读书——成功”的例子要多得多。这也坚定了玲玲父亲反对女儿上学的用心。

也就是说,社会公众乃至玲玲谈论的“读书有用”,与玲玲父亲坚持的“读书无用”之间,仍有着不近的距离,甚至可以说,二者并非是在讨论同一个话题。玲玲父亲理解的“用处”固然是现实之用,例如投入之后能不能有产出、产出如何等。而玲玲则是希望通过读书,让自己变得“更有修养、更有层次”,“做个有层次的人”,这里所言的“修养”也

好、“层次”也罢,与就业并无必然的关系。可以想见,这样的对话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结果。

因此,若是想真正说服玲玲父亲拿钱出来,供女儿上大学,仅仅开列一些高尚的理由,如提高综合素质,开阔视野,增加修养等等,难以让其信服。因为这些理由与改善家庭生活乃至命运并不一定相关,何况,当今的大学教育是否真能帮助玲玲成为一名有素质有修养的公民,并不乐观。而且,因为在底层谋生的不易,玲玲父亲甚至对城里人所谓的品味多有偏见。比如,他就批评城里人“特别假”。

在读书是否有用上,还需拿出切实的“成绩单”来,不能一味指责玲玲父亲不解风情。要能够让玲玲这样的父亲也能看到,读书不仅能够陶冶情操,提高品位,也可以让人生活得更美好,知识确实能够改变人的命运。

(来源:中国青年报)

言论观点

人民日报:
把握好互联网这个“最大变量”

互联网是把“双刃剑”,如何让它成为治国辅政、凝聚共识的助手,而不是搅乱社会的推手,关键在于我们树立阵地意识,积极介入,因势利导。把握好互联网这个“最大变量”,最关键的是要有“阵地不能丢”的忧患意识,有“兴利除弊”的媒介素养,有“能力升级”的创新精神。

北京日报:
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

在事关意识形态领域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,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、掌握主动权、打好主动仗。尤其是对一些人极力宣扬的所谓“普世价值”、“宪政民主”、“新闻自由”等,任何时候、任何渠道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和方便,该管的要管起来。

北京晨报:
守土尽职 责无旁贷

身处宣传思想工作第一线的媒体工作者,要守土尽责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,坚持党的宣传纪律,增强“喉舌”意识,发挥“桥梁”作用和“纽带”作用,增强新闻的吸引力与感染力,杜绝未经查证的虚假与不实新闻。作为社会良心所在,传播正能量。

新民晚报:
安全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底线

人类的城市发展史表明,安全是城市兴盛存亡的首要条件。天灾让一些城市变成废墟、文明中断。人祸导致城市衰退乃至消亡。有些人从概率论角度出发,为城市事故的发生寻求理由。这种论点并不成立,所有人为事故和灾难,主要是社会缺乏“责任感”的结果。

过好教师节 比改期更重要

■魏文彪

据报道,国务院法制办日前公布《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(征求意见稿)》,拟将教师节日期改为9月28日。

延续了29年的9月10日教师节面临改期,引发社会热议。

教师节具体定在哪天,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,关键在于如何把节过好。设立教师节的初衷是为了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,并通过切实举措关爱教师。在这个意义上,教师节日期是维持现状,还是改为9月28日的“孔子诞辰日”,并不是问题症结所在。

如果全社会都在这一天形成对尊师重教认识的高峰,不更改教师节日期,也同样可以达到设立教师节的目的;反之,如果尊师重教做得不够,则无论教师节设在哪一天,都缺乏实际意义。

当然,保障教师权益并不是提倡教师节学生送礼之风,而应该思考怎样从制度上改善教师的从业环境。

我国教师的整体地位已获较大提高,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存较大差距。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教师,其薪资待遇亟待改善。正因如此,相比于争论如何选择教师节日期,更重要的是促进社会各界探索如何为教师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,如何让教师更符合时代的标准,推动教育事业更快发展。今年的教师节又要到了,每次过节,也应成为集中反思教育问题、查找薄弱环节的契机。如此,教师节才算是过得真正有意义有价值。

(来源:人民日报)